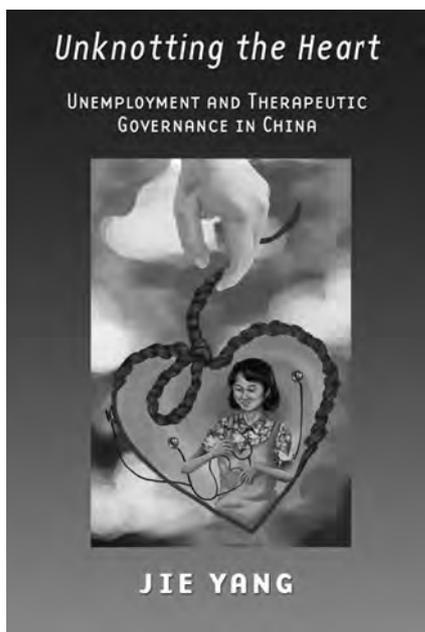


心理治療與基層治理

——評 Jie Yang, *Unknotting the Heart: Unemployment and Therapeutic Governance in China*

● 安孟竹



Jie Yang, *Unknotting the Heart: Unemployment and Therapeutic Governance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90年代初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讓無數國營企業面臨着破產和改制的命運，大批生活在國家和單位體制庇護下的國企工人遭遇下崗。

這一社會經濟結構的鉅變通常被社會學家視為「社會斷裂」的標識。曾經「端着鐵飯碗」的國企工人被要求擺脫對國家的依賴，自力更生，這對他們而言不僅意味着社會階層的重置，更加挑戰着他們在生命記憶沉澱下產生的對單位的情感依賴，以及「國家主人翁」的身份認同。雖然「工人階級」在官方話語中的地位保留了下來，但工人與國家的關係卻在激進的經濟體制轉型下悄然發生了改變。人類學家楊潔的問題意識在於：這種犧牲一代人的經濟政策為何沒有帶來大規模的反抗和衝突，反而表面看來風平浪靜，甚至被中國經濟學家盛讚為「和平式革命」^①？她試圖從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治理邏輯變化中尋找答案。

與其他關注市場化轉型的學者不同，楊潔並沒有從單位體制解體的組織結構變遷中去考察國企工人的處境。在以私有化為特徵的一系列體制、組織、階級結構變化之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層面是工人自身對這一系列變化的內在認知和體

1990年代初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讓大批生活在國家和單位體制庇護下的國企工人遭遇下崗。這種犧牲一代人的經濟政策為何沒有帶來大規模的反抗和衝突，反而表面看來風平浪靜，甚至被中國經濟學家盛讚為「和平式革命」？

驗。楊潔試圖從這一心靈的面向入手，在《解開心結：中國的下崗與治療型治理》(*Unknotting the Heart: Unemployment and Therapeutic Governance in China*，以下簡稱《解開心結》，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中通過對北京市昌平區一家國營手錶廠下崗工人安置的研究，揭示出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治理技術日益呈現向個體心靈層面滲透的能力。

全書共分為六個章節，前兩章聚焦於作為國家基層象徵機關的居委會，如何為下崗工人提供包括心理諮詢服務在內的再就業培訓。楊潔在第一章開宗明義地指出，在後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幸福指數已經成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和治理效力的重要指標；在這一背景下，讓下崗工人重新理解自身的境遇，並培育積極心態面對，成為基層心理工作者幫助下崗工人獲得「幸福」的自反性實踐。第二章描述了「助人自助」的心理工作者如何說服工人放棄對國家的依賴；作者強調，「自力更生」的話語在不同歷史語境中具有不同的含義，毛時代「自力更生」的意識形態強調的是國家的獨立自主，而在當代，這一沿襲下來的話語更多地指向個體自我。

第三章聚焦於「送溫暖」的扶貧項目，作者敏銳地發現，這一活動看似旨在為貧困的工人提供物質支持，然而情感表達才是這一活動的本質內容，這種情感的撫慰本身也具備廣義上的心靈療愈效果。作者在第四章中描述了心理工作實踐呈現出的知識混雜狀態：這些基層心理工作者大多是黨員幹部出身，僅僅接受了短期心理治療培訓，在諮

詢服務中融合了合理情緒療法、敘事療法等不同的知識「邊角料」；作為社會主義時代意識形態教化技術的「思想工作」方法也成為基層心理工作者借鑒的資源。

在第五、六章中，心理治療不再僅僅被當做一種心靈療愈的專業方法來討論，作者認為，心理治療培訓也為下崗工人提供了再就業的機遇。第五章介紹接受了基本心理治療培訓的下崗工人在與客戶聊天的過程中提供了情感陪伴服務，轉型為專業「陪聊」；由於女性氣質與關懷照護之間的聯繫，這一新興職業大多由女性承擔。與女性轉型成為專業「陪聊」不同，第六章敘述了開出租車成為男性下崗工人的普遍出路，雖然一部分在再就業培訓中接受過心理治療培訓的出租車司機變成了「車輪上的心理諮詢師」，但他們中大部分依然對國家對於工人的背棄難以釋懷，壓抑的憤懣讓失落和困頓的情緒在這一群體中蔓延。

一 「治療型治理」

楊潔注意到與1990年代下崗潮相伴而生的一系列社會現象：在「再就業支持」工作中，基層管理者所關注的不只是崗位提供和技能培訓，更是下崗工人的「心理疏導」；這種心理疏導或以心理諮詢、談話治療的專業名目出現，或以「送溫暖」、「思想工作」的形式滲入社會主義的治理傳統之中。根源於西方個人主義傳統的心理學知識在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甚至下崗工人

在「再就業支持」工作中，基層管理者所關注的不只是崗位提供和技能培訓，更是下崗工人的「心理疏導」：或以心理諮詢、談話治療的專業名目出現，或以「送溫暖」、「思想工作」的形式滲入社會主義的治理傳統之中。

自己在接受了短期的心理治療培訓後也轉行成為「陪聊」，成為積極心理學的傳播者。楊潔試圖用「治療型治理」(therapeutic governance) 的概念去理解心理學知識在下崗工人安置工作中發揮的作用(頁 xv)。

「治療型治理」源於上個世紀 70 年代精神病學家薩斯(Thomas S. Szasz)對「治療型國家」的批判。與福柯(Michel Foucault)相似，薩斯將矛頭指向醫療體制與國家治理的結合，指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與社會利益相衝突的個人問題不再以宗教意義上的「善/惡」或法治意義上的「合法/非法」而被評價、鼓勵或禁止，而是被重新理解為各種精神疾病的症狀，醫療干預和救治成為應對這些問題的合法化方式。這一新的權力實踐形態被薩斯稱為「醫權政治」(Pharmacracy)，它是一種根據官僚化的健康照護規範、由醫療實踐者所執行的社會制裁。在這一框架下，心理失調成為社會問題個體化的語義學策略，種種干預策略的目的則在於使不安定的個體恢復平靜和順從^②。「治療型國家」扮演著資本主義時代「江湖郎中」的角色，它說服人們相信自己有病，並且需要國家醫療代理人的服務^③。被治療者被塑造為缺乏應對日常生活壓力之能力的個體，只有依賴「專業」的幫助才能夠重獲自尊和健康的人際關係。這種「專業」的幫助多數時候成為社會控制的同謀，個體的自主生活選擇權成為犧牲品^④。

社會學家諾蘭(James L. Nolan, Jr.)提出的「治療精神」(therapeutic ethos) 概念是「治療型治理」的另一

種演繹，他關注的是心理學家所運用的理念、實踐和話語怎樣讓他們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繼承了宗教的救贖工作，扮演著世俗化的精神指引角色，成為一個「新祭祀階層」^⑤。總之，與傳統的強力控制手段相比，「治療型治理」代表著一種更為人性化的、溫和的治理風格，其中混雜了理解、關愛和管控、規訓的多個面向。

如果說 1990 年代中國的基層下崗工人安置工作同樣具有治療的色彩，那麼它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項自上而下的社會工程。讓楊潔更為關注的是，治療的對象——下崗工人的「心靈」與「自我」——如何在一系列「真理體制」中被生產出來。在楊潔看來，下崗失業所引發的個體焦慮原本是一種「社會性苦難」(social suffering) 的心理表徵，卻在心理學知識的介入下被歸納為「失業綜合症」，是久在「大鍋飯」、高福利體制庇護下的工人應對生存環境變化時的無能表現(頁 11-13)。這種話語策略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1930 年代美國失業潮中的「自助運動」(Self-help Cooperative Movement)，當時的社會工作者強調，失業不是悲慘的境遇，而是尋覓新的職業的契機。在中國市場化轉型的背景下，單位體制對工人的意義也不再被演繹為一種承諾和保護，而是對個體能動性的束縛，是需要掙脫和超越的，下崗意味著重生。

「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⑥——「從頭再來」的關鍵在於自我的調整和改造。心理諮詢師、社會工作者在這時粉墨登台，通過在各種場合向下崗工人灌

楊潔用「治療型治理」的概念去理解心理學知識在下崗工人安置工作中發揮的作用。與傳統的強力控制手段相比，「治療型治理」代表著一種更為人性化的、溫和的治理風格，其中混雜了理解、關愛和管控、規訓的多個面向。

輸積極心理學的知識理念，這些披上了一層「專業」外衣的基層心理工作者企圖幫助工人調整心態以應對下崗帶來的貧困和痛苦，同時力圖調動他們的「潛能」來實現再就業。以治療之名，行治理之實，這個矛盾的概念本身就蘊含着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它絕不僅僅是為了幫助下崗工人撫平心靈創傷，更重要的是將他們改造成符合市場經濟需求的理想主體，將他們投入市場大潮（頁53）。這樣的心靈療癒服務於國家的體制轉型目標，體制轉型所帶來的陣痛需要在個體的心靈空間中被消化。

二 心靈治理的策略： 「思想工作」

心理學作為一種源於西方個人主義傳統的知識，是如何滲透進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成為後社會主義時代基層治理的新興知識資源？在居委會、工廠工會、再就業輔導中心這些基層治理單元之間穿梭的楊潔，發現了心理學實踐與社會主義治理傳統——「思想工作」之間的隱秘聯繫。

上世紀50至60年代，心理學知識曾經被中國當政者視為有害且無用的資產階級發明而從高等教育知識體系中剔除。在革命年代，沒有個體的心理失調，只有革命思想意識的落後。以意識形態教化為目標的「思想工作」成為社會主義時代基層管理者「解開心結」的手段。三十餘年後，這一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遺產正承載起新的內核。楊潔

注意到，經過心理治療培訓的基層管理者正在被改造成「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具有專業資格的心理諮詢師也會被居委會聘用，為下崗工人提供心理輔導服務（頁60）。脫胎於社會主義時代的「思想工作」方法，後社會主義時代的基層心理工作者更樂於將他們與下崗工人的「談心」視為一種「專業」的談話治療。談話雙方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改變：如果說「思想工作」的目的在於對個體的政治意識進行內在的審查和監視、用革命意識形態改造個體的「錯誤」認識，那麼談話治療則旨在讓下崗工人自己充分言說，但這種言說的邏輯可以在基層心理工作者的「專業」引導下被隱秘地改寫，下崗工人自身的境遇、經驗和感受也在這一過程中被重新組織和理解（頁118）。無論這種治理策略的效力如何，「思想工作」的「心理化」、「專業化」轉型已然將專業主義和科學主義融入到後社會主義時代統治權威的建構之中。

此外，被承襲下來的還有社會主義時代的話語資源。楊潔在本書中列舉了「自力更生」在「再就業支持」動員中的改造運用。曾經，官方話語中的「自力更生」形容的是中國在冷戰封鎖背景下對國內生產能力的依賴，鼓勵着舉國上下參與革命的決心；而在市場轉型的背景下，「自力更生」話語被基層管理者重新調用，以鼓勵工人擺脫對單位體制的依賴，成為積極進取的、靠自己能力謀生的市場主體。革命話語的承襲和改造傳遞出市場經濟的道德精神，它不再強調個體為革命事業作出犧牲與奉獻，而是鼓勵下

以治療之名，行治理之實，這個矛盾的概念本身就蘊含着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它絕不僅僅是為了幫助下崗工人撫平心靈創傷，更重要的是將他們改造成符合市場經濟需求的理想主體，將他們投入市場大潮。

崗工人「提升自身素質」、「克服心理障礙」，走向市場，實現自身的價值，暗渡陳倉地奠定新自由主義時期的主體性塑造(頁65)。心理輔導借助社會主義時代的政治遺產，煥發着生產性的能量。

如果說心理輔導和「思想工作」的目的在於轉化個體對自我的認識，那麼將認識轉化成行動的關鍵便在於對「潛能」的調動和管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潛能」定義為人在還未做某事的時候所具備的做某事的能力，是一種將能力轉化為行動之前的懸置狀態，其中也包含着對未來的某種承諾^⑦。正如作者所說，人的潛能只有經過特定方式的干預和調動才能夠被激活，並最終得到釋放(頁20)。在楊潔筆下，下崗工人的潛能調動基於一種本質主義的性別想像。女性工人的「老實、有同情心、對他人關懷備至」被視為一種與生俱來的積極潛能，在接受了短期的心理治療培訓後，她們能夠以「陪聊」這一非正式心理諮詢師的身份重新步入就業市場(頁152-53)。「陪聊」的客戶是「想不通」的下崗工人，經歷過自我調適的再就業女工扮演起心靈療愈師的角色，力圖幫助客戶發掘、激活他們的潛能，投入經濟改革的浪潮。楊潔認為，「陪聊」是一種具有女性氣質的情感勞動，為了勸慰鼓勵他人，「陪聊」的下崗工人不得不反覆詢喚起自身的痛苦經驗(頁5)。與其說她們是在提供專業的心理諮詢服務，倒不如說其情感撫慰的有效性更多地來源於「女性的溫柔陪伴」；也正是這種介於「專業」與「性化」之間的勞動特質，讓

她們的工作常常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

相比於女性而言，在下崗潮的背景下，男性身上的陽剛氣質則不再被視為能夠轉化為生產力的有利資本，而是一種具身的(embodied)消極潛能，包含着向暴力反抗等破壞性行為進行轉化的可能性。在勞資衝突頻發的情況下，男性下崗工人變成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隱患」，治理的關鍵在於如何對這種消極潛能進行積極轉化。從這一角度出發，楊潔注意到國營工廠「送溫暖」活動(基層管理者利用節假日向「困難群眾」發放慰問金、食品、衣物)的意義所在。在企業改制、工人下崗的1990年代，「送溫暖」活動不僅是一種面向社會邊緣群體的財富再分配的福利制度，而且具備了更深的情感治理色彩。正如楊潔在田野中所發現的，「送溫暖」活動的主體對象並不是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地位更加不利的女性和農民工，而是國營工廠的男性下崗職工(頁103)。這種治理策略利用了中國社會傳統送禮習俗中人情互惠的道德機制，「送」的意圖在於調動起「收」禮者(下崗工人)的感激和虧欠之情，並在這一過程中吸收對方的批評和抱怨。它既是基層管理者對下崗工人物質生活的積極干預，更是一齣展示人道主義關懷的社會戲劇，其目的在於駕馭甚至轉化男性下崗工人身上的消極潛能，從而消解可能的衝突和反抗(頁93-101)。

雖然下崗潮背景下的「送溫暖」活動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強烈的性別化特徵是令人生疑的，但楊潔對性別這一變量的強調提醒我們注意：

女性工人的「老實、有同情心、對他人關懷備至」被視為一種與生俱來的積極潛能，在接受了短期的心理治療培訓後，她們能夠以「陪聊」的身份重新步入就業市場。那些在革命年代近乎被抹平的性別氣質差異，卻在下崗工人的安置實踐中重新得以展現和強調。

楊潔在關注現代心理學的「真理體制」如何在下崗工人安置實踐中起作用的同時，生動地描述了下崗工人對這一治理技術的擁抱、拒斥和反思性運用，以及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怎樣被塑造成理想的市場人。

那些在革命年代近乎被抹平的性別氣質差異，卻在下崗工人的安置實踐中重新得以展現和強調。市場化時期的理想主體不僅是懂得自我調適和反省的，同時也是「性化」的。

在種種心理技術背後，一種全新的權力形態——「懷柔權力」(kindly power) 在後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浮現出來(頁xiv-xv)。這種權力以關懷、鼓勵而非強制的面目出現，也在春風化雨中傳遞着一種強調個體責任的幸福觀。它將工人對單位的依賴問題化，鼓勵個人激發自身的潛能，投入市場大潮；同時，它將下崗所帶來的痛苦從社會經濟結構中抽離出來，讓個體的注意力從對政策和權力部門的質疑轉向內在的救贖(頁50)：問題不在於經濟體制轉型所帶來的貧困與階級分化，而在於自我的改造、潛能的激發、機遇的把握。

三 治理的效力與解釋的效力

在楊潔看來，下崗工人想要在新的經濟潮流中重新取得一席之地，就不得不成為積極心理學的消費者(頁205)，重新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通過自我的反省與調適轉變為「自力更生」的市場人。成為市場人的欲望構成了這種自我轉型的催化劑，正是在這個心靈無意識的層面，心理技術展示出了治理的效力。然而，也正是在這個心靈無意識的層面，同樣存在着抵抗的可能^⑧。正如本書提到，工人對再就業輔導中心的各種心理服務並非全

盤認可，相反，這些「食洋不化」的心理服務被許多人諷刺為「忽悠」。比這種懷疑主義姿態更甚的是「罵街」，與權力部門直面的語言交鋒透露出下崗工人拒絕將社會問題轉化為個體困境的自覺。但非理性的宣洩常常被基層管理者貶斥為「潑婦罵街」(頁185)，這種道德批判源於具有貶義色彩的女性刻板印象，讓工人零星的抵抗顯得尤為脆弱。

當心靈的撫慰和治療不只是一種內在的轉變，而是具有向生產力進行轉化的潛質，所謂的「治療型治理」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種「生命政治」的實踐。二十世紀福柯等人提出的「生命政治」讓生命本身成為權力捕獲的對象，無論是對身體的規訓還是對人口繁育的調節，其目的都在於使生命成為「國家的」生命^⑨。嵌入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中，生命的「國家化」也意味着讓生命成為旨在獲利的資本，權力實踐的目標從對生命的保全轉變為對生命繁榮和福祉的追求：不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活出生命的「價值」。「生命政治」的實踐包含兩條並行的軌道，一是治理的對象及其特定經驗如何在一系列權力配置之下被生產出來；二是個體如何通過「自我技術」將自身塑造為特定的主體，這一主體性塑造的過程又怎樣讓個體臣服於權力意志^⑩。楊潔的研究緊緊扣住了這兩個面向：在關注現代心理學的「真理體制」如何在下崗工人安置實踐中起作用的同時，生動地描述了下崗工人對這一治理技術的擁抱、拒斥和反思性運用，以及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怎樣被塑造成理想的市場人。

2016年,《解開心結》一書獲得了東亞人類學學會「許氏圖書獎」(Francis L. K. Hsu Book Prize),在獲得英語學術界充分肯定和讚譽的同時,也遭遇了一些業內批評。有學者質疑,北京市昌平區的個案對於整個中國基層社會應對下崗工人安置的代表性:昌平區位於首都近郊,從1990年代以來,心理諮詢服務已然遍地開花,為基層治理所徵用也不足為怪;那麼在經濟狀況各異的其他地區,心理學的話語和實踐是否也能夠在下崗工人安置工作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批評者糾結的並不只是昌平個案的「特殊性」問題,更是直接指向楊潔在本書中的核心論點:現代心理學到底在後社會主義的治理邏輯中佔據怎樣的位置?它已經成為基層治理的核心要義,抑或僅僅是「去政治化」時期湧現出的「奇技淫巧」^①?楊潔注意到了社會主義政治遺產在當代心靈治理中的沿革,卻並未釐清心理學話語、社會主義道德範式、中國傳統文化的心靈觀之間「載體」與「內核」的關係。如果說這些不同的知識體系因為具有指向心靈的面向而被統統塞進「治療型治理」的框架中,那麼這種治理形式在甚麼意義上才可以稱得上是「現代的」?回溯中國五千年的權力政治歷史,又有哪一代當政者的權力實踐不具有觸動靈魂、改造人心的一面呢?

或許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治理的觸角是否正在向個體的心靈滲透,而在於新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它意圖將人心改造成甚麼樣子。曾經的「我」是單位大家庭的一份子,

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支柱棟樑,相信「咱們工人有力量」;現在的「我」必須「放下思想包袱」、發掘潛能、把握機遇,做個積極進取的市場人。楊潔對此的立場是批判性的。在她看來,積極心理學只能製造一種虛幻的幸福想像,卻無力為真實的苦難提供結構性的治療方案。將體制轉軌、階級重構的社會陣痛擠壓進工人的內心世界,是粗暴且殘酷的。

《解開心結》一書至少在兩個層面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其一,放在市場轉型背景下「工人—國家」關係的研究脈絡中來看,楊潔沒有落入物質剝奪、身份失落、生計問題的窠臼,而是試圖從後社會主義治理技術的角度切入下崗工人的心理經驗,他們如何理解自身的遭遇、對未來生活的期許如何被現代話術所形塑。其二,在人類學界眾多關注「中國社會心理熱」議題的學者中^②,楊潔是第一位完成民族志著述的作者。她將「心理熱」放在下崗潮的背景下,剖析根植於西方歷史傳統的心理學話語,如何通過下崗工人安置的治理實踐向社會邊緣群體延伸的過程。正當楊潔2002年開始在北京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頁ix),心理諮詢師已成為國家勞動部承認的、具有專業資格的服務類職業,心理諮詢培訓業正在中華大地上蓬勃發展,成為欣欣向榮的朝陽產業。在專業建制之外,心理話語也在向更廣闊的社會滲透。十幾年時間裏,傳媒已經將各式各樣的心理訪談節目帶入千家萬戶,滿足了普羅大眾的獵奇之心,也提供了一種新的自我理解與審視的知識框架。

現代心理學到底在後社會主義的治理邏輯中佔據怎樣的位置?楊潔注意到了社會主義政治遺產在當代心靈治理中的沿革,卻並未釐清心理學話語、社會主義道德範式、中國傳統文化的心靈觀之間「載體」與「內核」的關係。

在今天諸如北京這樣的都市裏，楊潔筆下的「陪聊」行業正逐漸沒落（亦可以說發生了「色情化」的轉向），那些曾經被歷史裹挾的下崗工人是否依然相信「心若在、夢就在」^⑬已無從知曉，心靈療癒卻正在成為城市中產階級化解焦慮的途徑。面對五光十色的「心靈工作坊」、「家庭治療」、「療癒讀書會」、「正念療法」，未來的研究不僅需要關注受眾的轉變，新世紀的「心理熱」產生了哪些變體、如何影響城市中產群體的自處之道，同樣是不可規避的議題。

註釋

① 胡鞍鋼等：《擴大就業與挑戰失業——中國就業政策評估（1949-2001年）》（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2），封底。

② 參見 Thomas S. Szasz, "The Therapeutic State: The Tyranny of Pharmacracy", *The Independent Review* 6, no. 4 (2001): 485-521。"Pharmacracy"由兩個希臘文字根構成："Pharmakon"（醫學的）和"Kratein"（統治）。

③ 許甘霖：〈醫療化、醫權政治與治療型國家：一個策略—關係取向的批判〉，《社會分析》，第3期（2011年8月），頁126。

④ Andrew J. Polsky, *The Rise of the Therapeutic St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4.

⑤ James L. Nolan, Jr., *The Therapeutic State: Justifying Government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1.

⑥⑬ 劉歡：《從頭再來》（1997），歌詞。

⑦ 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著，王立秋、嚴和來譯：《潛能》

（桂林：灑江出版社，2004），頁295。

⑧ 齊澤克 (Slavoj Žižek) 著，應奇等譯：《敏感的主體：政治本體論的缺席中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66-70。

⑨ 關於「生命政治」的討論，參見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張廷琛等譯：《性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阿甘本著，吳冠軍譯：《神聖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等。

⑩ 勒薇爾 (Judith Revel) 著，潘培慶譯：《福柯思想辭典》（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頁23、121、145。

⑪ Dorothy J. Solinger, "Unknotting the Heart: Unemployment and Therapeutic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4 (December 2015): 1104-1106; Hsuan-ying Huang, "Unknotting the Heart: Unemployment and Therapeutic Governance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90, no. 1 (2017): 120-22.

⑫ 更多的「中國社會心理熱」相關研究，參見 Andrew B. Kipnis, "Introduction: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Individual Psyche", in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Individual Psyche*, ed. Andrew B. Kipn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1-16; Hsuan-ying Huang, "The Emergence of the Psycho-boom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in *Psychiatry and Chinese History*, ed. Howard Chiang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4), 183-204; Li Zhang, "The Rise of Therapeutic Governing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edical Anthropology* 36, no. 1 (2017): 6-18等。

安孟竹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博士候選人